



# 目 录

## 前 言

- 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黎澍 ( 1 )
-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 李新 ( 10 )
- 试论历史与现实的区别与联系…………… 孙思白 ( 26 )
- 关于现代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问题…………… 丁守和 ( 38 )
- 关于“二战”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魏宏运 ( 54 )
- 开垦中国现代史学领域中的处女地…………… 彭明 ( 61 )
- 从中国现代史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探讨  
    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的建立…………… 王桧林 ( 71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是中国现代史的开  
    端…………… 张宪文、丁永隆 ( 82 )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应该从“中国  
    现代史”中分离出来…………… 吕明灼 ( 96 )
- 中国现代史体系问题刍议…………… 李光一 ( 103 )
- 中央根据地反第一次“围剿”概述  
    …………… 索世晖、郭德宏 ( 122 )
- 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浅析  
    …………… 邱松庆、孔永松 ( 144 )

# 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黎澍

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到现在已经两个年头了。今天是第三届年会，全国各地都有人来参加，专家、学者、教授；老年、中年和青年的史学工作者济济一堂，盛况空前，令人欣慰。我想借此机会讲一点个人意见。

一、学会成立两年多来，在党的领导关怀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学会的工作取得了进展。我们已经举办了两次学术讨论会，第一次是1980年在郑州，收到论文105篇；第二次是1981年在大连，收到论文137篇；这次在厦门大学举行是第三次了，至今已收到论文113篇。我们还举办了中国现代史讲习班，参加者有120人，承蒙全国各地现代史专家、学者热情支持，担任讲课，参加的人反映很好。

近年来，现代史的研究工作越来越引人注意。在全国各种刊物上发表的现代史方面的论文越来越多，专题资料和专题著作也有出版。在一些问题上有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由李新同志领导的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工作，受到国内外历史学界的注意。这些情况为我们展示了很好的前景。

学会的工作主要是靠几位中年同志，就是本学会的各位秘书长同志，他们的努力，加上各地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现代史学会有了今天这样的规模和成绩，我们应当深深地感

谢他们。希望大家努力遵循党的十二大指引的路线，争取更大的成绩。

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二大刚刚结束，我们应当根据十二大精神来规划和安排我们的工作，努力使现代史研究也能开创一个新局面。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无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中国现代史，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并编写出一部高水平的中国现代史，不仅可以成为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而且可以帮助人民认识和掌握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我们每一个从事现代史研究工作的同志，都应为自己所承担的这一项既艰巨又光荣的任务而感到自豪，竭尽全力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三、现代史是一门新的学科，过去很长时期人们不大注意这个学科，而且似乎存在一种倾向，就是习惯于用党史代替革命史，用革命史代替现代史。现在人们看到了这个问题，开始重视现代史的研究工作，现代史学会成立的本身也可算是一个证明。

现代史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园地，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太多了。但在目前，总的来说，最基本的是搜集材料和整理材料的工作。

一般说来，任何学科必须在积累材料的基础上，才可能取得发展，就现代史而言，这是我们的前辈和许多现在还活着的人亲自参加的历史过程。大量的材料还以原始形态分散在各地。有些材料还保留在一些人的头脑里。由于我国近代教育文化落后，文书档案制度不健全，报刊出版事业不发达，所以这后一种所谓“活材料”更显得有价值。不论是散存各处的原始文献，还是保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材料，都有待我们去发掘、收集和整理。

一般说来，文字材料容易引起人们注意，保存在人们头脑里的材料，由于种种原因，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近年来有所转变，但仍有提起注意的必要。海外盛行所谓口述历史，这个方法很可借鉴，其实这个方法在中国确是“古已有之”。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做过这类工作，亲自访问过一些当时健在的历史人物。不过现代的口述历史，比较从前实在进步多了。解放以来，我们也做过一些访问调查，但由于“左”倾思想干扰，这项工作不能做得很认真，很有系统。许多老一辈的人相继去世，补救已经来不及了。从现在起，必须特别抓紧这样工作。

这项工作看起来似乎不难，要做得好，很不容易。其中也有许多方法上、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调查人必须事先基本上掌握有关的可靠的文字材料，据此拟定提纲，选定对象，排定次序，一一访问。在调查中还必须设法创造气氛，使人感觉讲真话是他的责任，因而不讲假话。此外，调查一件史事，必须尽可能多找到几个有关的人，对相同和不同的记忆加以比较研究，从中发现真实情况。现在科学技术进步了，利用口述录音，代替口问手写，还可以避免一些过失的差错。

很不容易的，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继续努力学习**的任务。我有几点粗浅的体会，愿意在这里提出来**就正于同志们**。

第一，我觉得要掌握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熟悉它的基本原理。要做到熟悉，就决不是读几本马列著作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必须尽可能地多读。我们难于要求人们一篇不漏地通读马恩列斯毛的全部已发表的著作。实际上，这未必十分必要。但凡属重要的著作、文章、讲演、通信、笔记等等，都应该读，要认真领会清楚。有些特别重要的著作，要经常重复读，联系实际，加深理解。

第二，为了透彻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应当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产生的，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如何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思想遗产。列宁就很重视这一点，他认为不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来源的那些前人的思想成就，就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他的这个指示对于我们中国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依照列宁的指示，就决不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误解成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某种宗派性质的学说。依照列宁的指示，就决不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同任何封建主义的东西联系起来。

第三，熟悉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目的是为了应用，如何应用也需要学习。谁应用得最好呢？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创始者本人**。所以我们学习马列著作，应当特别注意用心学习他们如何运用自己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如何同形形色色的理论上的敌人作斗争，可以学到怎样避免片面性，学习到怎样依靠自己的正确思想，并且仅仅是依靠自己的正确思想**制胜敌人**。

第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常提醒人们，不可把他们的

学说当作教条，当作公式，当作万应灵丹到处滥用。马克思本人，对于用这种态度对待他的学说的人，曾不得不宣布：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再明显不过地说明，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或个别词句当作公式到处滥套，这是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根本不相容的。任何一个真正有志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应该从一开始就力戒此种陋习，要知道，无论怎样好的理论，怎样高明的方法，终归是人家的创造，要使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必须花费艰若的劳动，通过长期的实践，由自己把它重新再现出来，这才算得真正掌握了它。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当成公式，乃至进一步变成口诀，以为在必要时念几遍，就能产生灵验，这是自欺欺人。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〇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曾经毫不含糊地提醒人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方面，树立了最杰出的典范。

对于我们从事现代史研究的人来说，必须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在深入研究若干复杂的历史问题的过程中，用心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坚持日久，必能真有所得。

我的这几点体会，不一定完全妥当，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同志的具体情况。我的主要意思是，要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花费异常艰苦的劳动，并且要持之以恒。

五、我还想关于在科学研究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问题略谈几句。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有一个批判各种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任务，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应当看到在历史学界我

们经常遇到的大量问题，还是认识问题，也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问题。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须要反复实践，这中间难免发生一些错误，或片面性，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克服片面性，才能达到正确的认识。科学史上可以找到无数的例证，在各国人民的革命史实践中也可以找到许多例证，甚至从我们每个人的亲身经历中也可以找到例证，来证明这一点。

历史科学的发展也只能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常常使许多第一流的学者为之殚精竭力，也只能解决部分的问题。往往也发生许多错误，还须后人继续研究，纠正前人的错误，使正确的认识逐渐完善起来。这就是要求我们历史学家在任何时候都要采取虚心谨慎的态度，切忌武断，切忌故步自封，以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真理是不可究尽的，须要不断提高我们的认识。

历史学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材料，一个是理解，或者用习惯的说法叫作史料和理论。史料总是逐渐发掘、逐渐积累起来。到今天，考古学不断获得的新发现还在继续丰富、补充或修正人们对古代史的认识，现代史研究也一样，前面我们谈到材料搜集的重要性和困难性，我们很难要求一个现代史学家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时，能够究尽所有的史料。所以就难以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在你研究某个问题并得出相当的结论以后，在某一个时候，你或者另外的人又发现了新的材料，这些新材料或者可以说明问题的另一侧面，或者可以修正前此所得的某些认识，有时甚至推翻原有的结论，也不



是不可能的。

这还仅仅说到材料方面，在理论方面更是如此，一个原来受资产阶级历史观影响的学者，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时候，很可以修正原来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仅如此，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人们中间，还有理解程度，掌握程度的不同。一个人理论上肯努力，有了新的进步，回头来审查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往往会发现大有修改的余地。由于主观客观条件的不同，掌握材料的情况不同，和理论水平不一，在同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人们中间，对同一个历史问题，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里可能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其中一方是对的，而另一方是错的；一种是，双方都只含有片面的真理，还有一种是双方都错了。在这些情况下，如果简单地宣布一方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方是非马克思主义，乃至是反马克思主义，这就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利于大家共同探讨真理。我以为最好的办法是大家平心静气展开讨论，经过互相辩驳，使真理和错误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使大家共同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目的。在科学上，发现错误和发现真理一样有价值，假如不许科学家犯错误，那么在人类历史上，科学便根本不能存在了。试问构成人类文明的哪一项新发明、新发现，是不经历许多失败和错误一下子就获得的呢？

我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希望大家第一要有探索的勇气；第二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提出一个新观念或否定一个旧观念，都必须有充足的理由，要以长期的研究为基础；第三，要创造大家都能平心静气讨论问题的空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 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

——主要谈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问题

李 新

我是学会顾问，但从学会成立以来，郑州、大连会议都未出席。这次厦门开会，会长黎澍同志邀请我一定要参加，因到西安讲学，迟了几天才来，很对不起大家。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

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历来有不同意见。如古代史的分期，分为三派：一派是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论”；另一派是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第三派是尚钺的“魏晋封建论”。这是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分歧，不应扣帽子。中国近代史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对于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看法。1956年，全国召开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会议时讨论过这个问题。高教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起草《中国现代史》提纲，那时现代史是指从1919年至1949年的历史。原来请胡华同志起草，当时因为他有病，便由我和彭明同志起草。起草过程中，我们感到把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现代史的开端不太妥当，我们认为通史嘛，不同于专史，通史应该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作为专史，例如现代文学史，从“五四”开始是可以的。作为通史，我们认为现代史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历史分期应该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应该根据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来划

分。这是我们的意见，当时我们是少数。讨论时，积极赞成的有孙思白同志，北京师大、广东中山大学的同志也支持。我们几个人是一种意见，但绝大多数，几乎所有研究近代史的同志都认为现代史应从1919年开始。我们一直不赞成，所以，我们的提纲没有叫现代史提纲，而是叫《中国近代史》（下）提纲。高教部的同志说，人家不赞成，你们就别叫现代史吧。所以，我们的书，最后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除了这一意见外，还有另一意见，认为中国现代史应该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他们的论据是，全世界从十月革命以后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世界史从十月革命后进入现代史，所以中国史也应该从十月革命开始作为现代史。这一意见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反对的人很多。我们当时就提出反驳意见。我们认为，十月革命以后，从全世界范围说，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但并不意味着十月革命到来后，全世界每个国家都进入了社会主义。正如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讲世界史时，以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作为分界线，十七世纪以前是封建社会，以后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法国近代史是从1789年大革命开始的，俄国是从十九世纪“农奴解放”开始的，日本是从“明治维新”，也是十九世纪开始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进入资本主义比英国还早。所以，从全世界来看是一回事，而具体到每个国家来说就不一样了。因此，每个国家的历史应该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划分阶段。当然还得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人类社会发展是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所以，划分历史阶段，既要按照统一标准，又要根据具体情况。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大约二、三百万年的历史了，这

是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的。在中国，猿人时代从何时开始，考古学家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说一百二十万年，有的说一百三十万年，甚至有的认为是一百六十万年或一百七十万年前。反正，中国人的祖先有一百万年以上的历史了。人类社会是漫长的，到现在为止，大体上经历了五种社会生产方式，这就是原始社会生产方式、奴隶制生产方式、封建制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因此以生产方式划分人类历史，最为恰当。当然，在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了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但归根到底，人类社会不同的社会制度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五种社会形态就是这样划分的。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国是唯一的国家，五种生产方式都有过。中国经过了漫长的原始社会，长期的奴隶制社会，更长期的封建制社会，一百年左右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然后从1949年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没有经过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实际上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什么叫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特点就是有资本主义生产，不过有许多是外国人或依附于外国人的，当然也有民族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单从数量来说，封建经济成分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内地还要占优势，但在国民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不是封建经济，而是比较集，尤其是中特别集中的如“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属于资本主义范畴，虽然不同于一般的纯资本主义社会。其实，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都不会是很纯的，只是相对而言。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比较纯，占绝对优势，但也有其他经济成分。中国资本主义比较少，但虽小却很集中，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与支配地位，如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

说，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不完整了，里面有了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比例不很大，但毕竟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现在，我们又有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有人说中国现在不是社会主义，那是什么呢？难道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不是很荒唐吗？当然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发达，还正在向前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应该按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来进行历史分期，包括全面考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化总是比较慢的，一般不是很激烈的。所以作为历史分期，生产方式是根本的，但究竟从哪一年算起，常常是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划分的标志。如中国历史的分期，常常就以某个朝代作标志。西方也是如此，也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为标志，如把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作为封建时代终结、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标志。但不能简单化，不能认为既然以政治事件作标志，就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分期的根本。把政治事件作为标志，必须反映出生产方式变化这个根本。如果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就是只考虑了政治事件，没有考虑社会经济这个根本，而把阶级斗争作为根本了。这正如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不能认为封建社会的历史只是农民战争的历史一样。毛泽东同志说，农民战争、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前进的动力，这是正确的。但这不是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只有农民战争、农民起义。更不能简单化地认为：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就认为封建社会的一切文化都是劳动人民的文化，我们只能继承劳动人民的文化。毛泽东同志说，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军事家、

文学家、发明家。那么，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是农民？农民诗人是谁？当然有民间诗人，但一提起诗人来主要还是屈原、李白、杜甫等。列宁有篇著名的文章——《青年团的任务》，其中说到：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继承了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而创立出来的，马克思以他能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而感到光荣。因此，搞历史研究决不能简单化。

中国历史应当怎么分期呢？我认为，可以从原始社会开始，把它叫做远古时期。从考古发掘看，中国原始社会从一百多万年以前开始。原始社会，很落后、很野蛮，是真正人吃人的社会，杀俘虏，吃人。接着进入阶级社会。中国奴隶社会是确实存在过的。但是不是从夏代开始，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很可能是从夏代就开始了。奴隶社会中奴隶制生产方式是主要的。但一个社会很复杂，不是绝对的纯，往往包含有几种生产方式。如在奴隶社会的初期有原始社会残余，后期又会有封建制的萌芽，但主要形态是奴隶制。奴隶社会有了剥削，创造了文明，如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出现了相当高度的文明。人类文明的开始就是剥削的开始。从没有剥削到剥削，从没有剥削制度到有剥削制度是人类社会一个巨大的进步。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剥削制度，生产力的继续不断发展才形成不同形态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最终才被否定，出现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能把剥削看得简单化，剥削是因为有条件才会产生，它要发展到再也剥削不下去了、无须剥削

们互相尊重，关系很好。唐朝的韩愈、柳宗元，两人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都很不一致，但他们的友谊很好，柳宗元死了，韩愈为他写墓志铭，很感动人。难道我们还不如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吗？我不同意尚钺的见解，但不能从政治上去无限上纲。我认为明代不管有多少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还是个封建社会。真正使中国社会起根本变化的，是在清代后期，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了，才逐步引起根本性的变化。据现有调查的资料，中国近代第一个民族资本主义的企业，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广东创办的一家丝厂。那么，我国在明代末期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呢？尚钺同志有个正确见解：落后的满族入侵内地，推迟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他这个观点也遭到批判，认为是违反“民族政策”。好象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不存在掠夺、压迫的问题，真是这么回事吗？我看不见得。金人南侵，岳飞抵抗，史有定论，但照批判者的观点看，金人没有南侵，岳飞抗金是违反“民族政策”。那么，秦桧投降岂不成了执行“民族政策”？很明显，这种观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如赞成这种观点，几百年后，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再看我们的历史，抗日战争也会成为不讲“国际主义”，汪精卫倒成为“国际主义者”了，能这样写历史吗？不能。要尊重历史条件。民国时期讲“五族共和”，但推翻清朝以前，主张与清朝“和平”的，被革命者看作是汉奸。各民族之间，既有和平与融合，又有战争与压迫，必须全面地看问题。

第二段：1851——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能不能称太平天国为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他们从来没有把农民起义说成“革命”，但对太平天国却称为“革命运动”。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从全局而言，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它把中国推向近代，推向资本主义化，它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称为“革命运动”。但从太平天国本身来分析，它虽受西方影响，特别在蔡仁珩的《资政新编》里面有很多资本主义的东西，却是没有实行。太平天国实行的那一套，从总体来看仍然是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时，还出现了所谓“洪秀全的正确路线”。洪秀全是“正确路线”为什么又失败了呢？把现代的东西硬套到过去，这是不对的。农民无所谓正确路线。农民起义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失败；或者如果胜利了，农民领袖就当皇帝，刘邦、朱元璋就是这样的。洪秀全到南京，当天王，那有什么“正确路线”？还是封建性的一套，他到东王杨秀清那里去，仪仗队多庞大呀，前面的已到东王府，后面的才刚出天王府呢。把农民起义领袖比作无产阶级领袖，那是十分荒唐的。因此，我现在称太平天国起义，或太平天国运动，不称革命。但这也引起不少人反对，说我贬低了农民运动。我认为没有贬低，而是对农民运动要有恰当的评价。我们党是非常重视农民运动的，但中国的农民运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之下、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成功；当然，西方资产阶级是领导过农民运动的。如果我们把农民运动吹得不得了，不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作用，那是不对的。毛泽东同志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获得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在



破产，义和团运动的失败。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一定要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线，予以足够重视。吴玉章同志对甲午战争很重视，范文澜同志也很重视。因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订立了《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到中国来开工厂，同时外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从商品输出为主进而以资本输出为主，通过不平等条约到中国来开工厂，修铁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发展却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如康有为等的公车上书、戊戌维新；革命运动，如孙中山等搞的兴中会。都是发生在甲午战争以后的事。戊戌维新是个改良主义运动，它不以推翻统治阶级为目的。革命派并不拒绝改良，但不是以改良为目的，而是要推翻旧的统治、建立新阶级的统治，它只把改良作为一个前进的阶梯。改良又是革命的副产品，越有革命斗争就越有改良；对统治阶级，你越敢斗，它越退让，你不斗，它就反攻。但在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还没有形成一个潮流，改良主义运动是有进步意义的。义和团运动是此起彼伏的一场农民自发的反帝爱国斗争，还没有形成为全国性的高潮，就被镇压下去了。义和团也没有真正的一个领袖和比较明确的政治纲领。“文化大革命”中把义和团吹得不得了，特别是“红灯照”，几乎成了个现代的“妇女会”。其实，义和团运动中许多非常原始、落后的东西，如对外国采取简单的排外，这些都是不足取的。当然，义和团运动很有意义、它对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起了很大作用。但我们不能把农民斗争过分理想化，不能用想象代替历史。历史是科学，不是文学。历史著作要写得生动，不能干巴巴的，但不能靠想象、